

托育服務的國際觀……

邱貴玲

壹、導言

臺灣的老年人口自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邁入聯合國定義下的老人社會以來，有關人口老化，和生育力降低的問題，開始成為政府制定社會政策的一大議題。為了應付人口老化問題，政府相關單位提出了提高生育力的對策，希望經由生育力的提高，來平衡未來可能因人口老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問題。

臺灣所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早在數十年前已發生在許多其它西方國家，除了北歐等幾個人口較少的國家如瑞典、丹麥、芬蘭等國家外，還包括德國、法國等因戰爭而亟待復員的國家。當時這些國家，提出了「增加婦女勞動力」和「提高生育力」來解決人口老化和可能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Siim, 2000)。

以「增加生育力」而言，許多西方國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供家庭津貼補助家庭養育子女費用。如德國、法國及北歐等國家，每

多生一個子女，家庭津貼就跟著提高，家庭津貼的額度因此也成為家庭多生育的一大誘因 (羅秀青，一九九九；Siim, 2000)。

就「提高婦女勞動力」而言，這些國家提出了完整的勞動配套措施，包括留職留薪產假、彈性選擇的育嬰假、質優價廉的托育服務等各種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的優惠福利，讓婦女不必因為結婚、生育、或幼兒養育問題而進出職場，兒童父母可以安心工作，不必擔心兒童的安全和照顧問題 (郭靜晃，一九九九)。以產假為例，丹麥的有薪產假達廿八周，父母同享的育嬰假達一年，法國的產假為了鼓勵生育，從第二個子女出生開始，產假可達三十六周，瑞典的新生兒父母的一方，可以在產假後，享有九個月的全薪育嬰假 (郭靜晃，一九九九；Kamerman and Kahn, 1991, 1995)。除了優厚的產假和育嬰假外，另一個有效提高婦女勞動力的政策，就是提供全面的質優價廉的托育服務，讓所有就業父母不論職業，不分收入，不分婚姻狀況，都可以將子女送到政府設立或大力補助的托育服務系統 (Leira, 2002)。

今天的臺灣社會中，無論是「增加生育力」，或是「提高婦女勞動力」，研究發現都發現托育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許多婦女不願多生小孩，是因為托育安排和養育支出的沉重負擔；婦女無法出外工作，也是因為必需照顧子女或是無法負擔托育費用（傅立葉，一九九五；劉毓秀，一九九七；張晉芬等，一九九七；郭靜晃，一九九九；王麗容，一九九九）。因此，本文認為社會老化的問題，也是兒童福利的問題，更是婦女福利的問題。解決社會老化的問題，是多面向的政策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先解決托育問題，讓更多的婦女減輕養育子女的負擔，讓更多婦女出外就業，增加家庭經濟收入，提升婦女的經濟基礎，讓更多的青壯年不分男女，在年輕就業時，培養個人經濟條件，累積收入，妥善理財儲蓄，為老年的經濟安全做好保障，而不是以養兒防老作為自己年老時的唯一生活依靠。換言之，質優價廉的托育服務，除了可以讓婦女增加生育的意願外，也促進婦女出外就業，還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減少貧窮，更可增加個人儲蓄減低養老負擔，是一舉數得的社會福利服務。

根據主計處「民國八十八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發現，我國十五歲至四十九歲婦女，百分之六十七自己照顧子女。臺灣地區，有工作的職業婦女中，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有六歲以下的幼兒，而這些職業婦女中，又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子女都在三歲以下。由於三歲以下幼兒的托育，影響家庭和婦女就業的層面最大，而且在我國也尚未納入幼教系統，除了家庭成員照顧外，其它仍以使用家庭托育服務為主，因此在管理和品質監督上也較為複雜。

基於國內對托育服務的需求，本文因此選擇丹麥三歲以下兒童托育服務的實務設計為主要討論，作為我國托育服務設計的經驗參考。選擇丹麥，主要因為丹麥擁有全世界最完善、精良的托育服務網絡，政策目標也最為寬廣，丹麥全國六歲以下的兒童均享有國家提供的托育服務和選擇。丹麥也是將托育服務列入生育政策、勞動政策，和兩性平等政策範圍，執行最徹底的國家之一。因此丹麥的實例，足以作為目前全世界所有福利國家在托育政策設計的最高指標（Kamerman and Kahn, 1995; Leira, 2000, Siim, 2000）。

本文以實務設計為探討方向，主要因為除了政策立意良好外，托育服務實務層面設計的完善，更是丹麥有效執行政策，落實政策目標的主因之一（Kamerman and Kahn, 1995）。因此本文希望從托育服務設計中，期待一個建立我國未來托育服務的遠景。

貳、托育服務的政策思考

長久以來，托育問題一直被視為是影響世界各地婦女就業的一項重要關鍵因素（Zimmerman, 1995; Pearson, 1989; Redclift, 1989; Parker, 1989; 傅立葉，一九九五；張晉芬，一九九七；劉毓秀，一九九七；王淑英、賴幸媛，一九九七）。家庭責任對婦女的負擔舉世皆然，托育問題如果沒有先解決，家中有十二歲以下兒童的婦女就無法安心出外工作，如果家中有六歲以下幼童，沒有人照顧兒童，

除了出外工作，甚至連出門辦事都成為困難，更不用提三歲以下幼兒，婦女更是隨時將子女帶在身邊。城市的婦女，抱著子女在買菜做家事，鄉村的婦女背著子女下田工作。子女的照顧養育責任，佔去了家庭生活大部分的時間、精神、金錢和勞力。對婦女是一大責任，對職業婦女更是工作以外的一大負擔，對單親的家庭甚而還是一個生存和家庭的雙重壓力。

主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臺灣地區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中發現，臺灣地區婦女對政府福利需求的期待中，「普設公立托兒所及公民營機構設托兒所」的需求被最多婦女列為第一優先，其次為「給予彈性工作時間」，「給予留職停薪的育嬰假」等，顯示托育問題在我國婦女生活需求中的嚴重性（主計處，二〇〇一）。

臺北地區三歲以下幼兒托育費用，根據保姆協會（二〇〇二）估計，一天八至十小時的全日托約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元，廿四小時托育的費用約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元。以全國女性每月平均收入二萬八千元和男性三萬八千元計算，除了選擇保姆的問題外，保姆的費用平均約佔了一般家庭收入支出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這些數據顯示，托育問題是所有職業婦女家庭的一個嚴重的負擔和問題（主計處，二〇〇一）。

托育究竟應歸屬於「國家公領域」的範圍，或是「家庭私領域」的範圍？劉毓秀（一九九七）等學者從女性公民權的角度出發，認為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應由國家分擔其家庭照顧的工作，落實家庭的兩性平等，減輕婦女兩性分工的傳統家庭責任。張晉芬、黃玫

娟（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從女性就業角度指出，婦女就業受到結婚和生育的嚴重影響，許多婦女在結婚或生育後，退出職場，少數重回二度就業，更多是從此不再出去工作，或從此找不到工作。一旦丈夫失業或成為單親媽媽，家庭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張晉芬等學者（一九九七）因而主張婦女應該「一度就業，就業到底」，並指出這個政策的前提，就是讓婦女不必因為結婚、生育或其它如家務、照顧病人、照顧老人等家庭因素退出職場，而堅守工作職位，保障婦女個人經濟獨立和自主。

除了婦女的就業因素外，從托育的社會利益而言，馮燕（二〇〇二：一八九）參考西方學者研究也發現，良好的托育服務更可為社會帶來：兒童的自信和正面的社會技能；節省社會成本，減少未來在特殊教育、矯治教育和社會救助的支出；增進社會生產力和自立人口；提高勞動就業，可以讓父母安心就業，持續穩定工作；刺激經濟發展，良好的托育可以增加地區的就業條件，使更多父母加入勞動市場。這些因素都顯示，良好的托育服務不僅對家庭帶來正面的影響，對社會也有正面的助益。

托育服務除了被定位為增加婦女就業一大利器，也是促進家庭性別平等和婦女公民權的重要條件（Liljestrom, 1978; Ruggie, 1984）。Liljestrom（1978）和 Ruggie（1984）指出，托育服務是婦女就業和性別平等的問題，也是一個雙薪家庭中，兩個同等地位的父母，兩個賺錢養家的成員，兩個社會的公民，也是生活中的兩個個人，有其個別的時間安排和生活需求。有了質優價廉的托

育服務，婦女就不會陷入傳統的性別分工角色，家庭也不會將生兒育女視為婦女的理所當然的責任，婦女有更多時間安排個人生活，參與勞動市場和各種社會活動，成為一個經濟自主、生活自主的公民。

在這種公民福利的崇高理念下，許多以福利國為國家發展政策取向的先進國家如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在探討托育問題時，除了關照婦女就業和國家勞動競爭力以外，更從增加人口生育力，提升兩性平等，和促進公民社會參與力等更寬廣的不同角度，規劃設計其國家的托育服務網，將托育納入國家福利制度，讓民眾有更多的空間和彈性規劃家庭生活，選擇托育的方式，和更多的就業選擇（Sassoon, 1987; Kabeer, 1997: 187; Siim, 2000; Leira, 2002）。

為了協助雙薪家庭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協助單親家庭維持家庭生活水準，更為了促進社會兩性平等，北歐國家在托育政策大都分為三個主要方向：國家補助的托育服務網，育嬰假，托育津貼(Leira, 2002)。

在這些政策立意下，一些西方國家如何將政策目標落實在實務層面，也成了一個政策成功的關鍵因素。以下，本文將從丹麥三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網的設計、監督、規劃。希望從先進國家的政策發展中，提供我國學界在托育研究和政界在托育政策實際執行時的參考。

參、丹麥的實務經驗

一、政策目標

丹麥和瑞典是世界上兩個均富程度最高的國家（OECD, 2002）。二〇〇〇年底為止，丹麥人口約五百三十萬，十六歲至六十六歲的婦女，勞動率高達七三%，僅次於瑞典七八%，位居世界第二。婦女佔總勞動人口的四六%。其中，廿歲至五十歲的婦女，有八六%全職工作，顯示托育服務為丹麥就業婦女的一大需求。

丹麥的托育政策原則是：鼓勵就業、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並主張優良托育可以吸引居民和企業，造福社區。對丹麥職業婦女而言，托育服務不但減輕她們的育兒負擔，也增進了她們在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地位，不但有個人的經濟獨立能力和就業更好的就業條件，托育更保障單親媽媽家庭經濟生活條件的重要基礎（Leira, 2002: 38）。

二、服務對象和收費

丹麥的托育網絡組織之健全，全球第一（Jensen, 1994; Kamerman and Kahn, 1995; OECD, 2002）。托育視為國民的權利，服務對象擴及所有就業的幼兒父母，不分貧富，也不分婚姻狀態，幼兒父母可以隨時向社會局申請，由父母自己選擇托育方式，再由社

會局安排家長和保姆見面，或由家長參觀托育中心。

丹麥政府目前已全面提供托育服務給家中有七個月至六歲大兒童的家庭，由家庭自己選擇托育服務方式，包括：托育中心、托兒所、或家庭保姆，五歲至七歲兒童完全免費，五歲以下兒童，依兒童父母的收入，按比例收費。幼兒的托育成本中，政府平均負擔七十%，家庭負擔三十%。而家中每多一個幼兒，再減家庭負擔部分中的三十三%（OECD, 2002）。

Kamerman and Kahn (1995) 估計，丹麥男性平均收入約三萬八千丹麥幣，女性為三萬二千元。以夫妻加一個兒童的家庭收入約為五萬五千元計算，托育費約為家庭年收入的五點三%（中心托育）至四點八%（家庭保姆）。根據 OECD（2002）統計報告，丹麥三歲以下的幼兒有六十四%使用托育服務，包括：四一%由政府雇用或監督的家庭保姆照顧。十%在托育中心，十三%在兼收三歲以上兒童的幼稚園。

三、產假與育嬰假

在婦女就業相關福利方面，丹麥的產假為廿八周（適用於產婦），育嬰假一年（適用於嬰兒父母），均由政府立法保證六十%的薪資，產假以政府福利支出，育嬰假以失業保險給付。但多數雇主都以員工福利補足其它四十%的差額，所以丹麥的新生兒的就業父母多享有全薪留職留薪的育嬰假福利。

四、保姆訓練和督導

如上文所指出，丹麥有六四%的三歲以下幼兒使用托育服務，其中家庭保姆有四一%，中心托育為十四%，因此家庭保姆的訓練和監督，是政府托育服務網的重要一環。

丹麥的托育服務屬社會福利服務部門。分類包括：家庭保姆、托兒所（六個月至滿三歲以下），幼稚園（滿三歲至五歲），混齡托育中心（六個月至滿六歲），安親班（學齡兒童）。在所有托育服務系統中，約七十%屬公立，餘為私人經營。

保育員不等於教師，不作任何教學。保育員和兒童比率規定嚴格，托育中心的比率，〇—三歲以一個保育員平均負責二·七兒童（一：二·七）。三—六歲幼兒，一個保育員平均負責五·五個兒童（一：五·五）。家庭托育則為一：五或二：十為原則，保姆的未成年子女也計算在內。

除了政府直接管理或監督的托育中心外，丹麥的家庭托育系統也受政府社會局人員督導。家庭保姆由政府訓練發給執照，並由政府直接補貼托育費用給保姆。想要提供家庭托育的丹麥人民（不限男女），向政府社會局申請後，由政府派行政人員兩人一組前往作家訪，視察環境，查對申請者的犯罪記錄，符合資格者，開始接受兩周保育訓練，試用期為十二個月，試用結束後，每年固定受訓一周。每個月由社會局人員固定家訪，確保托育品質。合格的家庭保姆由政府保障福利，一周工作四十八小時，每年五周帶薪休假。政府的

政策原則是高福利可保障高品質托育，也可使保姆流動率降到最低（OECD, 2002）。

政府的監督方式還包括將同社區的家庭保姆三個人分成一組，讓保姆可以協調休假，還規定同組保姆每個月約時間固定帶兒童一起到社區的公立托育中心一起參加團體遊戲，讓托育的兒童互相認識，也讓兒童有團體活動的機會。同時在保姆休假時，兒童換人托育時也不會因新保姆產生陌生排斥感，托育服務的設計精緻而周全（Kamerman and Kahn, 1995）。

Kamerman and Kahn（1995）實地訪查丹麥 Hvidovre City 發現，當地的家庭保姆由社會局建檔監督。社會局的托育管理行政人員，平均每個社會局人員負責督導一一二個家庭保姆，共有三六〇個幼兒。所以每個社會局的工作人員，可以有效督導、訓練家庭保姆的品質和服務。必要時，還可以加強和就業父母的互動，對家長和保姆雙方都是一大品質保障。

五、小結

良好的托育服務的需求指標包括：可近性、可得性、可負擔性，和品質（馮燕，二〇〇二）。綜觀以上丹麥的實務討論，丹麥的托育服務的設計完全符合這些條件。從「可近性」來說，丹麥的托育服務由地方社會福利服務行政單位負責，以社區劃分，所以家長可以選擇個人最方便的托育地點。就「可得性」而言，丹麥托育服務是全民的福利，由政府全面提供，所有就業家長，只要有需求，

都可得到托育服務的供應，所以沒有資源不足或分配不均的問題。

就「可負擔性」來看，政府補助三分之二以上的托育成本，並以家庭收入依比例計算，托育支出約佔家庭全年收入的五%，對一般收入的丹麥家庭都是一個合理的負擔，而低收入的家庭則由政府免費提供，也不會造成貧富不均的問題。從「品質」而言，政府負起訓練、監督和管理的責任，所以無論是托育中心的保育員，或是在家托育的家庭保姆，政府都有固定的訪視和訓練，以專業執照和政府補助審核等方式來管理保育員和家庭保姆的品質及其工作態度，使托育品質得到保證，家長無後顧之憂。因此，丹麥的托育服務實在不愧為全球第一的盛名。

肆、我國托育需求和現有托育服務探討

從丹麥的例子反應出，一個質優價廉的托育服務並非不可行，但的確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行政力量投入。我國雖然生育力逐年降低，但兒童人數在全人口中仍佔相當比例。內政部統計處資料（二〇〇二）顯示，我國至民國九十年代，六歲以下人口達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五人，含總人口的十六點五八%。其中未滿三歲的幼兒有八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佔六歲以下兒童數的四七%。而根據主計處「民國八十八年人力資源運用調查報告」指出，臺灣地區，四九%的職業婦女有六歲以下的幼兒，而這些職業婦女中，

又有四六％的人，子女都在三歲以下。隨著臺灣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提高，家庭支出日增，婦女教育和就業機會增加，雙薪家庭已成為家庭生活型態的主流，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調查指出，我國婦女勞動率達四六％，而已婚婦女勞動率達五四點一％，其中五九％從婚前至今結婚生子都一直有工作，沒有間斷（主計處，二〇〇一）。這些實際的數據在在顯示托育問題已是社會一個重要議題，影響婦女就業的層面尤為深遠。

內政部兒童局資料指出（內政統計通報一，二〇〇二），我國至民國九十年底共有三千六百所托兒所，收托人數三十一萬八千九百九百一十八人，保育員和幼童的比例是一：一四．九一（相對於丹麥保育員和三歲以下幼兒的比例一：二．七；保育員和三至六歲兒童比例一：五．五）。而其中公立或公辦民營托兒所全臺只有二百九十七所，收托兒童有九萬七千八百三十八人。換算結果，我國在托兒所托育的兒童中，只有三十％的兒童在公立或公設民營托兒所中，其它兒童都是在私立托兒所。而更有許多統計以外的受托兒童在未立案的托兒所中，或交由家庭保姆照顧（內政統計通報一，二〇〇二）。而許多托兒所沒有申請立案的原因是「建物使用執照」和「合格師資遴聘有困難」等問題，沒有正式立案，主管單位也因此無從直接管理（羅秀青，一九九九；馮燕，二〇〇二）。

我國三歲以下兒童的托育服務，除了家庭保姆外，托育機構又分為托兒所和幼稚園。托兒所招收零至六歲兒童，屬社政單位主管。幼稚園招收四至六歲兒童，屬教育單位主管。

家庭保姆的訓練機構包括：社會局、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家扶中心、臺北市保姆協會、臺北縣保姆協會、中華民國保母策進會、兒童福利中心、臺北護理學院、輔仁大學等不同機構負責。受訓後的保姆可取得保姆執照，保證個人的托育品質（臺北市社會局托育服務資網，二〇〇三）。丹麥的托育政策中，因為政府補貼托育費用三分之二，沒有執照就沒有補貼，因此丹麥的家庭保姆都有執照，家長也不會將子女交給沒有執照的保姆，否則就得自己負擔全部的托育費用。如此的作法形成一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臺灣的保姆執照只是個人的品質證書，沒有管理也沒有追蹤和後續監督。因保姆費用由家庭獨力支出，保姆的品質只能由家庭自行選擇和負擔結果。

從我國現有的托育服務政策來看，主要仍將生育視為家庭私事，所以養育子女也因此被視為父母的個人責任。國家以兒童福利為出發點，為功能失調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務，因此公立托育定位為弱勢家庭的殘補式福利，而不是全民的制度式福利。傳統觀念中，三歲以下的幼兒應由幼兒母親在家全日照顧，由父親出外工作提供經濟所需。所以在福利國的發展模式中，我國仍接近Esping-Andersen, (1990) 所劃分的英國、美國等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為主的福利模式，除非是特殊需要的家庭如貧窮家庭、單親家庭、身心障礙兒童家庭等，托育問題都被視為是家庭私事，主要由家庭經濟負擔，由市場機制購買解決，而不是國家公共政策全民福利的一環。

近幾年來經濟轉型，出現中高齡失業問題，單親家庭增多，婦女就業的需求和重要性，也因婦女個人教育程度提高，就業機會增大，而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婦女就業對個人的經濟自主，和對家庭經濟生活的貢獻也更趨重要。

已婚婦女的就業對家庭生活而言，家庭因為有兩份全職工作的收入，所以在家庭有一方失業時，所受的經濟和生活衝擊，相較於只有單薪家庭來得較小。不幸遭遇單親時，家庭生活也較不會陷入困境。在今天社會失業率高漲的情況下，已婚婦女就業對家庭經濟生活的穩定有絕對的幫助。從經濟層面來看，雙薪家庭除了有效提升家庭生活品質外，在經濟環境變遷時，也可使社會減少貧窮家庭問題。

因此從婦女個人、家庭生活或從社會觀點的角度來看，雙薪家庭已是一個不可免的社會趨勢，也是未來社會政策發展重點。然而，雙薪家庭在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壓力下，首先面臨的就是兒童托育問題。傳統社會，照顧兒童一向被定位為婦女的責任，許多婦女因為家庭和工作無法兼顧而放棄工作。在這種發展趨勢下，托育服務的社會政策思考因此由過去的「兒童福利」角度，進一步推展到「家庭政策」、「婦女福利」的領域，隨著婦女教育程度提高，勞動參與增加，托育已不再是兒童的發展問題，而延伸為家庭生活的直接議題。

未來，臺灣婦女的勞動政策，如張晉芬等學者所指，應從鼓勵「二度就業」提升為「一度就業，就業到底」，讓更多婦女可以安心

加入勞動市場，參與社會活動。而最重要的就是先解決家庭中的幼兒托育問題，從丹麥的實例討論中，不難發現，一個良好的托育服務網，首先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政策目標，是鼓勵生育？或是提高婦女勞動力？是促進兩性平等？增進公民福利？或是解決社會老化問題？臺灣目前的托育政策仍屬家庭私事的領域，公立托育服務以家庭特殊需求如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者兒童者為優先，對廣大的家庭而言，仍是停留在自給自足，自求多福的階段，由於托育政策方向不明，所以無論在鼓勵生育或提高婦女就業，或解決社會老化問題上，都沒有確切的執行目標和方法。

以我國目前的托育服務網來看，仍是在以市場經濟為主，托育的品質以價格高低為指標，由家長自行選擇和解決，在立案的管理上也監督不嚴，家庭保姆的托育更無法管理。從丹麥的托育服務來看，公立托育服務的設立和公家補助的監督，成了品質管理的有效利器。如馮燕（一九九七）所指，托育需求的產生原因，主要來自社會的變遷，所以滿足托育需求的責任，也應由社會承擔，由政府執行。未來在臺灣托育服務政策的發展上，如何確立政策目標和方向，選擇管理機制和方法，將是托育服務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所有家庭能否得到價格合理，品質優良的托育的重要基礎。

（本文作者現任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助理教授）

◎ 參考書目：

王淑英、賴幸媛（一九九七）。「臺灣的托育困境與國家的角色」。收於「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劉毓秀主編，頁一二七—一六〇。臺北：女書出版。

王麗容（一九九九）。展望廿一世紀家庭政策—給婦女一個選擇。中華民國社會福利學會：家庭、社會政策及其財務策略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計處（二〇〇二）。「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臺灣地區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主計處編印。

主計處（一九九九）。「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主計處編印。

內政統計通報一（二〇〇二），臺北：內政統計通報九十一年第二十三週。臺北：內政部出版。

內政統計通報二（二〇〇二），臺北：內政統計通報九十一年第四十九週。臺北：內政部出版。

郭靜晃（一九九九）。「幼托人員合流之分級制度可行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八六期，頁二八〇—二九八。

馮燕（一九九七）。「家庭需求與福利政策—制定托育政策的探究」。臺大社會學刊。二五期，頁一四—一七八。

馮燕（二〇〇二）。托育服務：生態觀點的分析。臺北：巨流文化公司。

劉毓秀（一九九七）。「父權國家，媽媽政府」。收於「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劉毓秀主編，頁一一—二二。臺北：女書出版。

張晉芬（一九九五）。「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之剖析」。收於「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一九九五年」。劉毓秀主編，頁一四五—一八〇。臺北：時報出版。

張晉芬、黃玫娟（一九九七）。「兩性分工觀念下婚育對女性就業的影響」。收於「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劉毓秀主編，頁二二七—二五三。臺北：女書出版。

傅立葉（一九九五）。「建構女人的福利國」。收於「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一九九五年」。劉毓秀主編，頁七—三六。臺北：時報出版。

羅秀清（一九九九）。「德國學齡期兒童托育及其對臺灣之啟示」。社區發展季刊。八六期，頁二九九—三〇九。

Barrett, M.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Verso: London.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nsen, J. (1994). Public child Care in an Equality Perspective In Carlsen and Larsen (Eds.), *The Equality Dilemma*, pp. 103-117.

Kabeer, N. (1997). *Reversed Realities: Gender Hierarchies in Development Thought*. New York: Verso Press.

Kamerman, S. & Kahn, A. (1991). *Child Care, Parental Leave, and the Under 3s: Policy Innovation in Europe*. New Haven, CT: Auburn Press.

Kamerman, S. & Kahn, A. (1994). *A Welcome for Every Child: Care, Education, and Family Support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in Europe*.

- Arlington, DC: Zero to Three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Infant Programs.
- Leira, A. (2002).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Welfare States: Family change and Policy Reform in Scandinav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ljestrom, R. (1978). "Sweden" in kamerman, S. and kahn, A. (eds.), *Family Policy Government and Families in Fourteen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OECD (2001).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Denmark. Background Report, OECD Thematic Reviewo 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OECD.
- Parker, G. (1989). Who Cares?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ritain. in R.E. Pahl (Ed.), *On Work: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Blackwell Press.
- Pearson, R. (1989). *Female Workers in the First and Third Worlds: The Greening of Women's Labor*. in R.E. Pahl (Eds.), *On Work: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Blackwell Press.
- Redclift, N. "Gender, Accumulation and the Labor Process" in R.E. Pahl (Ed.) *On Work: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Blackwell Press.
- Ruggie, M. (1984). *The State and Working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itain and Swe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oon, A. (1987). *Women and the Sate: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ondon: Hutchinson.
- Siim, B. (2000). *Gender and Citizenship: Politics and agency in France, Britain, and Denmar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immerman, S. (1995). *Understanding Family Policy: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